

战胜困难才能走向胜利

——毛泽东在七大讲的“十七条困难”和“八个胜利”

□ 倪德刚

(一)

七大制定的总路线是建立一个新中国，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，一个独立的、自由的、统一的、富强的中国。如何实现这个总目标，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困难。他在七大结论报告中，讲了十七条困难，诸如，外国大骂、国内大骂、丢失根据地、损失若干万军队、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、党内出现悲观心理、经济困难，等等。毛泽东讲这些困难是提醒和告诫全党：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，但是一定要想到，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，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，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，对待困难要透彻地想好。准备了麻烦，麻烦就少，世界上的事，大体上都是这样。讲困难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要夺取胜利。

讲了十七条困难后，毛泽东紧接着就讲了八个我们一定要胜利：第一，暂时吃亏，最终胜利。这个原则是不会错的，终究我们要胜利的，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。第二，此处失败，彼处胜利。东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，我们总有出路。第三，一些人跑了，一些人来了。天要下雨，他硬要跑那有什么办法？今天有些人跑了，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，我们说一定会有许多人会来的。第四，一些人死了，一些人活着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，但总有活着的。这样大的党，这样大的民族，怕什么。第五，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。自己动手，发展生产，克服困难。第六，克服天灾，太行有经验，这些经验很好。第七，党内发生纠纷，这也是给我们上课，使我们获得锻炼。来一次大纠纷，就是一次大锻炼。毛铁炼成钢，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敲打的。第八，没有国际援助，学会自力更生。没有援助有一个好处，援助太多了也有一个坏处。要学会自力更生，准备没有援助。不是只有外国援助，我们也援助外国。

能否取得这八个方面的胜利，这考验我们党成熟了没有，有本事没有。



(二)

有本事的党就要善于领导。什么叫领导？坐在指挥台上，如果什么也看不见，就不能叫领导。坐在指挥台上，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，那是平平常常的，也不能算领导。毛泽东说，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，当桅杆刚刚露出的时候，就能看出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，并能掌握住它，这才叫领导。

陈独秀时期，农民要土地，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，但是那时候陈独秀看不见。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个东西，以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打，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赶走，于是产生轻敌观念、速胜论盛行。毛泽东的结论是，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，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。小东西看不见，也会犯错误，但那只是一点一件的错误，牵涉面不大，这种错误十个、八个也不是很要紧的。当然，犯了这样的错误也不好，但毕竟不算大错误。凡是大的错误，就是对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看不到。

有本事的党就要善于预见。什么叫预见？所谓预见，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，在眼前出现了，这时才预见；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，就是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的时候，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，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，就能看见，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

义，这才叫预见。

有本事的党既要善于领导也要善于预见。毛泽东指出，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从来没有预见，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。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，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，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。我们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，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很清楚。领导和预见是什么关系？毛泽东的结论是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，为着领导必须在预见中领导，在领导中预见，我们才能实现奋斗目标。

(三)

实现奋斗目标，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。党的七大工作方针是团结和胜利。毛泽东说，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，而不是向后看，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。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，以组织我们的队伍。事情总是不完全的，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，向比较完全前进，向相对真理前进，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，达不到绝对真理。所以，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。

实现奋斗目标，就不要骄傲急躁。毛泽东告诫全党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，力量还小，前面还有困难。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，不要骄傲急躁，要戒骄戒躁。谦虚就不骄，就可以戒骄。从前讲“大贾深藏若虚”，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，好像没

有一样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要保持谦虚。在我们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，就是大不得。一大就胀起来了，骄傲起来了，心里也躁了。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，骄傲就要急躁，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、不谨慎的、粗枝大叶的。

实现奋斗目标，要向中央看齐，向大会看齐。一个队伍经常是不整齐的，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，向左看齐，向右看齐，向中看齐。毛泽东强调，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，向大会基准看齐。看齐是原则，有偏差是实际生活，有了偏差，就喊看齐。一个队伍里头，人们的思想有正确的，也有错误的，经常是不整齐的。经常不整齐的原因何在呢？毛泽东指出：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：一个教条主义，一个经验主义。关于教条主义，毛泽东举个例子，他说：教条主义，那厉害得很！长凳一定要叫长凳，不能叫条凳，叫条凳是路线错误！

实现奋斗目标，全党团结得像一和睦家庭一样。毛泽东讲，过去常说，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，那是写文章的词藻。我们这回说，团结得像一和睦家庭一样。家庭是有斗争的，新家庭里的斗争，是用民主来解决的。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。对有缺点错误的人，我们也要团结。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，为全国胜利而奋斗，不达胜利誓不休！

七大闭幕不久，毛泽东专门率领参加七大的全体代表和延安人民的代表，开了一个追悼会，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说。他说，有几十万共产党员、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都牺牲了。牺牲的人，从很高职位的到火夫、马夫、战斗员、工人、农民都有。这一次我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，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套建立一个独立、自由、民主、统一、富强的新中国的路线、纲领、政策。这套东西是从几十万的共产党员、成百万的革命民众的流血牺牲中得到的。

毛泽东强调，我们开大会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要完成烈士们交给我们的责任。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一定要把黑暗的中国从地球上除掉，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。这个目的一定能达到，不达目的是不停止的！

以史为鉴

史海拾贝

刘志丹坚持让大家称自己『老刘』

□ 钟宪章

被毛泽东誉为“群众领袖，民族英雄”的刘志丹，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，历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、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、前敌总指挥等职。但战士干部却很少称他“总指挥”“主席”，而是称他“老刘”。习仲勋在《习仲勋忆与刘志丹往事》一文中写道：1932年7月间，我在耀县杨柳坪找到了陕甘游击队，在这里，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，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“老刘”。

警卫员谢文祥初到刘志丹身边时很拘谨，刘志丹摸透了他的心思，经常问长问短、十分亲切。谢文祥见红军指战员和老乡都亲切地以“老刘”称呼他，慢慢地也管刘志丹叫“老刘”。所以，“老刘”就成了大家对他的称呼。有一次，一个小战士跟着别人叫“老刘”，旁边的同志批评道：这孩子一点礼貌也没有。刘志丹笑着说：“那就得叫我伯伯了，这不成家长了，还是叫‘老刘’亲热嘛。”在群众眼里，没有什么称呼比“老刘”更亲近、更直白、更缩短距离的。一声“老刘”，叫出的是刘志丹与红军指战员、与人民群众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，是“同志”这一称谓在特定环境里的生动体现。语言是思想的载体，称谓本身貌似小问题，但背后蕴含的思想方式就是大问题了。

刘志丹坚持让大家称自己“老刘”，表面上只是称呼问题，本质上是坚持党的宗旨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刘志丹心里想的不是人们称呼自己什么，他关心的只有党的利益、群众的福祉、斗争的胜利。

刘志丹坚持让大家称自己“老刘”，本质上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，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。“哪里有‘老刘’，哪里人最稠，男女老少都围满，话儿拉不够。”刘志丹时刻想着群众，老百姓也都把他看作自己人。有一位瞎眼的郑老婆婆虽然看不见刘志丹长什么样，一听刘志丹过来了，便张罗着让儿媳把养麦面“炒得干干的，压得细细的，让‘老刘’他们好好吃一顿饱饭”。真正体现了鱼水深情。

刘志丹坚持让大家称自己“老刘”，本质上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“有了问题找‘老刘’”几乎成为陕甘边时期红军指战员的口头禅。为充分了解南梁的地理环境，刘志丹等从平定川、瓦子川到柳沟、麻地台川、井窑沟、荔园堡、南梁堡、东华池……走村串户，访贫问苦，成为远近闻名的“活地图”。

早在1980年，中共中央通过的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就明确规定：“在党内所有党员尽管工作分工有所不同，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，党内要互称同志，不称官衔。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：要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。由“××长”“老板”“老大”……等权力标志分明的称呼向“同志”这一耳熟能详的称谓的改变，显然不简单是字面上的改动，更是对党员干部灵魂深处的洗礼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力反腐、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方略的具体表现之一，对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、开展积极向上政治生活大有裨益。

完善配套办法

问责的目的，不仅在于惩戒，更在于强化责任意识，更好推动工作持久高效。对此，应加强配套办法制定，放大问责效应。一是建立被问责干部后续管理使用办法，不搞一棍子打死，给他们“出路”，让他们“东山再起”规范化、合法化，使其能够更好地吸取经验教训，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聪明才智。二是加快建立操作性强的容错减责免责办法。让那些出于公心干事，因为不可抗力或者客观条件限制，出现的失误能够被包容、减责甚至免责，切实解除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怕“因公受伤”的后顾之忧。三是高度重视推进依法问责。问责必须沿着法治化道路前进才有出路，才能长久。所以，各地各部门制定问责办法、细则，确定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清单，必须注重与已有的法律法规、党纪党规等有机结合，做到依法确责、依法问责。四是注重问责的系统性建设。当前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问责办法不可谓不多，问责力度不可谓不大，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问责呈现了“丛林化”“孤岛化”“碎片化”，缺乏体系性、协调性，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必须从当前的监督体制改革、政府职能转变、权责体制设计等着手，解决问责的体制“缺口”问题，为问责提供制度保障。通过以上努力，真正达到为敢于担当者担当，为敢于负责者负责。

党建视角

多措并举提升决策失误问责实效

□ 陈松松

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，党政领导干部有权必有责，有责要担当，失责必追究。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等相关文件的出台，为新形势下党政领导干部决策失误问责提供了制度依据。要从规范决策程序、明确问责主体、细化问责内容、开展决策失误评估、严格问责执行方式、加强配套办法制定等六个方面精准发力，联动配合，不断提升党政领导干部决策实效。

规范决策程序

程序化决策是能够规范决策行为，保障决策科学的有效办法。重大决策都是由一系列相关的程序衔接形成的，如果能够做到决策程序的每个关口科学规范，那么决策失误风险就会大大降低。在决策目标的选取阶段，要特别注意信息的收集、分析和整理，防止决策信息缺失和决策信息不透明；在决策方案的设计和论证阶段，要建立多种形式的民意调查和反馈机制，要把重大事项向社会公开，广泛调查民情、倾听民意，还要召集相关利益群体的决策听证会，以及专家学者组成的论证会，以预估决策可能带来的风险，提高决策的可行性；在决策实施阶段，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和相关执行机关信息的反馈，对具体决策事项适时进行修正完善。如果领导干部在以上几个方面能做到决策环节的科有效，将会大大减少决策失误行为出现，反之，决策环节方面的表现，就将成为他在决策失误发生后被问责的重要依据。

细化问责内容

以往对决策失误问责的规定多存

在内容界定不清，范围涵盖不广，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。为此，有必要对适用问责的决策失误情况进行明细。比如，可将决策失误进行问责的情形界定为：党政领导干部个人由于盲目随意决策造成失误的，要予以问责；个人专权造成决策失误的，要予以问责；违反决策程序和法律法规规定的，要予以问责；为了追求政绩、急功近利、谋取个人私利导致决策失误的，要进行问责；在集体决策时，提出错误意见的也要进行问责，等等。这样可把对社会造成重大财产损失、重大社会影响和主动作为，甚至乱作为的各类行为纳入问责范畴，提高问责的覆盖面，让党政干部充分认识到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“谁决策，谁负责”，避免人人有权、人人不负责现象的出现。

明确问责主体

当决策失误发生了并且予以确认后，那么由谁对决策失误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，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。由于对决策失误问责涉及面广，事项复杂，牵涉利害关系多，那么能够对决策失误者进行责任追究的主体最好是官方的主体。而且是地位高于决策失误者的主体，以权力去制约权力

才能取得较好的问责效果。

成立问责领导小组。为体现重视，由各地各部门党政一把手担任组长，这个小组主要起到协调和组织的作用，增强决策失误问责工作开展的权威性。

成立问责建议机构。这个机构主要由党的纪委（包括合署办公的监察局）的人员组成，工作职责是根据查明的决策失误性质和问题的严重程度，出具问责意见和建议。

成立决策问责执行机构。因为很多党政干部身份的多重性，也就造成追究责任时既有党纪处分，又会有行政处分，严重的还要法纪处理。为此，要综合纪委、人大常委会、检察院和法院的力量进行处理。总之，通过明确责任追究主体，维护其权威地位，加强其进行决策失误问责工作开展的领导力。

组建决策失误评估机构

党政领导干部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有多大，问题严重程度怎样，我们既要看问责建议机关的调查取证，同时还需要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鉴定。第三方评估机构应该是独立于问责与被问责主体之外，既可以是官方性质的，也可以是非官方的，而且以

非官方的组织为主，其从业人员往往具有党政部门相关工作经历，有相当的专业知识背景，熟悉各类党纪条例和法律法规，具有较高职业素养。由于该机构是独立的法人，从业人员具有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相对独立性，与问责、被问责主体都没有太多利益关联，所以选取其进行决策失误评估对于提高办案透明度，提高可行性和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此外，进行决策失误调查时，问责处理机关还会根据掌握的材料和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，向决策失误责任人进行审核，决策失误责任人如果对相关调查结果不满意，或者认为违背事实的，本人还可以就某些事项进行申诉，合理的意见将作为减轻处分的依据，如果没有事实证明评估报告的不当之处，就应该严格按照评估报告进行问责。这种引进第三方的评估模式，既解决了办案方涉及利害关系放不开手脚、有时难以做到公正的问题，又可以解决被问责者的心理质疑，可谓是一种问责双方和社会大众都能接受的较好方式。

严格问责执行

再好的问责制度，如果不能执行也将是一纸空文，起不到应有的震慑